
阎锡山私通日本的历史考察

张广汉 叶昌纲

抗战时期,阎锡山私通日本一事早为世人所知。那末,阎锡山为什么私通日本?阎锡山私通日本与汪精卫之流卖国投降又有什么区别?本文拟就这些问题略加探讨。

一 阎锡山私通日本的行径

抗战期间,阎锡山私通日本,涉及政治、军事和经济等诸方面,其主要行径:

(一) 赞助日本建立和巩固日伪山西政权

日本侵略者为推行其“以华制华”策略,在侵占太原后的1937年年底,开始在太原地区网罗地方豪绅、旧军官曾纪纲、高步青、白文惠等,成立伪山西省政府筹备委员会,作为其统治山西的工具。与此同时,阎锡山在“抗日要准备联日”的思想指导下,派亲信宋彻潜往北平,联络他早已安插在平、津从事“联日”活动的成员苏体仁等回晋,准备成立伪组织。1938年6月,苏体仁回太原后,即秉承日本特务机关的旨意,将原日伪山西省政府筹备委员会改

请参阅孙凤翔:《我所知道的日伪山西省政府顾问室》,载《山西文史资料》第12辑;赵瑞:《阎锡山勾结日军的罪恶活动》,载《山西文史资料》第4辑;牛新田:《山西日伪政权的建立和覆灭》,载《山西文史资料》,第41辑。

陈少校:《阎锡山之兴灭》,香港致诚出版社1972年版,第164页。

请参阅孙凤翔:《我所知道的日伪山西省政府顾问室》;赵瑞:《阎锡山勾结日军的罪恶活动》;牛新田:《山西日伪政权的建立和覆灭》。

组为日伪山西省公署，自任省长，并委任宋彻为民政厅长、白文惠为警务厅长等。从此，苏体仁等便在日阎之间拉线搭桥，充当阎锡山私通日本的媒介。1941年10月，随着国际法西斯势力甚嚣尘上，阎锡山抗战思想更加动摇，故加快私通日本的步伐。为此，他派亲信赵承绶与日本华北派遣军第一军参谋长楠山秀吉在太原进行关于履行《汾阳协定》细则的谈判，决定在太原、汾阳、临汾、运城等地设立“办事处”，作为他私通日本和辅助日伪政权的常设机关。1943年年底，阎锡山又令“太原办事处”处长梁缜武、军事代表王乾元、政治代表靳祥垣与日军签订《秘密协定》，其中规定“日方政权机构和地方武装中，阎方可以继续派人充职”；“阎方可以动员‘治安区’（即敌占区——笔者）内的旧日部属和有关人员到二战区受训，受训毕，陆续前往太原，经过阎方政治代表靳祥垣转介绍于日方审查，分别任用”。根据这一规定，阎锡山又于次年3月“复派李其祥率三十余人抵并（即太原），李担任伪教育厅教育科长，其干部半数参加同蒲南段各县工作，半数参加县政训练所受训后分配工作”。日本战败投降前夕，因日伪山西省公署人员尤其是其中的高级官员预感末日来临，多有辞职或潜逃者，故日方再次向阎方提出速派厅长级和道尹级行政人员到太原，听候任用。阎锡山即派其得力干部李崇方、孟祥祉等多人到太原，准备接任日伪山西省公署厅长和道尹等职。不仅如此，阎还保举其亲信朱绶光或梁上椿准备接任日伪山西省长，为他战后恢复在山西的统治作准备。

（二）同日军签订共同“剿共”军事协定

抗战期间，阎锡山出于反共的需要，曾多次派亲信官员同日军进行秘密谈判，签订军事协定、协议等。1939年11月，阎锡山通过其部下梁培璜等与日军清水师团在临汾举行军事谈判，商定，日军帮助阎锡山的晋绥军剿除在山西境内的八路军和决死队，而晋绥

赵瑞：《阎锡山勾结日军的罪恶活动》，《山西文史资料》第4辑，第35页。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436页。

军之一部改编为“中国抗日忠勇先锋队”，专事“剿共”。1940年6月，阎锡山派代表与日军在太原签订《军事协定》，规定，日军为与晋绥军初步实施“合作剿共”的方针，先将灵石境内之双池镇据点交给晋绥军驻防，并由晋绥军骑一军速派部分兵力，以“佯攻”形式占领该镇。1941年3月，阎锡山又派代表赵承绶等与日军若松旅团达成协议，即日阎双方首先消除敌对行为，互相提携，共同防共；离（石）军（渡）公路以北地区对共军的“防御进剿”由日军负责，离军公路以南等地区由阎军负责，必要时，双方可“实行会剿”。同年9月，阎锡山再派赵承绶为代表与日军华北派遣军第一军司令官田边盛武等在汾阳县谈判并签订了《日本军与晋绥军基本协定》和《停战协定》（总称为《汾城协定》），规定：日阎双方“停止一切敌对之战斗行动。本共存共荣之旨……首先铲除共产主义之破坏而密切合作”等等。1943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形势紧迫，侵晋日军陆续调往南洋，兵力不敷分配，故派人与阎锡山商谈汾东和上党地区的合作问题。同年年底，阎锡山即令梁缙武等人与日军在太原签订《秘密协定》。该协定规定：日方同意除浮山、安泽两县外，再将翼城、曲沃、长子等9县（绝大部分为抗日根据地）分期“让渡”给阎方接管；日阎双方共同分担“剿共”任务，铁路沿线及其它交通要道和重要据点由日方负责，共产党区域由阎方负责，必要时，经过联系，进行“会剿”。直至日本投降前夕，阎锡山还与日本华北派遣参谋长高桥坦约定：“首先将山西省南部一带的警备让给阎锡山警备，进一步密切联系有关共同合作对付共军”等事宜。

（三）同日军交换物资，互通有无

赵瑞：《阎锡山勾结日军的罪恶活动》，《山西文史资料》第4辑，第5、6页。

中共中央党校编写组：《阎锡山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4页。

[日]白井胜美编：《日中战争》第5集，日文版，第455页。

中共中央党校编写组：《阎锡山评传》，第378页。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5页。

抗战期间,阎锡山为了“自存”与反共,同日军在经济方面也以物易物,互通有无。1941年10月,阎锡山派赵承绶与日本华北派遣军第一军参谋长楠山秀吉签订的《日阎合作条款》中,曾规定双方交换物资的项目,即阎方以桐油、生漆、桃仁等换取日方的纸张、西药和布匹等。次年夏,日方鉴于阎方经济拮据尤其是粮食奇缺的状况,不仅放松了对阎方的军事封锁,默许阎军在日军占领区域的汾阳、平遥、介休等县抢粮40万担,而且还出动军车替阎军从汾阳至孝义运送粮食5000担。与此同时,阎方则将大批的桃仁、桐油等物资输送给日方,作为报偿。1943年春,日本第一军高级参谋井宽一在向阎提出《日阎政治、军事、经济合作方案》,建议日阎双方共同管理太原附近各厂矿,将阎锡山原来投入各厂矿的资本所有权交还,作为阎方的股本;日方在占领太原后新增加的资本,归日方所有,实行“经济合作”,并提出双方共同组织“董事会”管理之。阎锡山遂于同年秋,派其西北实业公司经理彭士弘为“经济代表”,并携该公司总务处长贾英云等多人,赴太原和日方协商所谓“经济合作”问题。其结果,双方联合组成了以河本大作为会长、彭士弘为副会长的日阎合办工厂的“五人董事会”,负责管理日阎双方在太原各厂矿的军用物资生产与交换等事宜。同时,日阎双方还分别指定“大仓洋行”、“钟纱公司”和“第二战区长官部经济突击第一队”为物资交换的执行机关。至于双方交换的物资,经商定,阎方向日方提供羊皮、中药材、桐油、生漆、水银、桃仁等土特产品,日方向阎方提供布匹、食盐、硫化氢等工业品。1944年秋,阎锡山还指使其军队伙同日军在浮山、安泽等县,大肆进行抢粮活动,所抢粮食由日阎双方瓜分。

陈少校:《阎锡山之兴灭》,第185页。

赵瑞:《阎锡山勾结日军的罪恶活动》,第26页。

陈少校:《阎锡山之兴灭》,第205页。

陈少校:《阎锡山之兴灭》,第207页。

赵瑞:《阎锡山勾结日军的罪恶活动》,第32页。

二 阎锡山私通日本的原因

抗战期间,阎锡山之所以私通日本,进行妥协活动,其主要原因:

(一)“剿共”的需要

阎锡山是众所周知的反共人物。用他的话来说,他“从未放弃对中共报复之念”。即使是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七七事变前夕,他还在山西成立“防共委员会”和“防共保卫团”等反共组织,迫害共产党员和群众。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虽因形势所逼,不得不暂时和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但与此同时,他又积极进行“防共”的准备,即所谓“联共又要准备剿共”。抗战开始不久,他的军队土崩瓦解,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以及牺盟会、决死队却不断壮大,阎锡山的反共思想便又重新抬头。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季林所说:“虽然阎锡山与共产党保持联合,但共产党力量及影响,在山西惊人的发展,使阎锡山感到万分惊恐,于是他越来越变得敌视共产党。”1939年3月秋林会议期间,阎锡山曾对他的军官们说:“抗战以来,晋绥军抗光了,唯独八路军不但不减少,反而增加,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今后还有我们晋绥军立足之地吗?”在阎锡山看来,坚持抗战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的存在和发展,对他的军阀政权的存在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必欲彻底剿灭。对此,他自己也毫不隐讳。他说:“目前咱们的处境很不好,蒋介石要借抗战之名消灭咱们……共产党对咱们更不好,到处打

郭彬蔚译编:《日阎勾结实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

中共中央党校编写组:《阎锡山评传》,第257页。

陈少校:《阎锡山之兴灭》,第164页。

[美]唐纳德·G·季林著,牛长岁等译:《阎锡山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00页。

《薄一波同志揭露阎锡山通敌叛国内幕》,《解放日报》,1944年8月14日。

击咱们，八路军在山西各地有严密组织，把老百姓都拿过去了。如果日本人再打咱们，那就只有被消灭……咱们如果想在中国求生存，非另找出路不可。存在就是真理，只要能存在住，以后怎么转变都可以。如果存在不住，还能谈到其他事业吗……权衡情况，目前只有暂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发展咱们自己，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也是咱们唯一的出路。”

（二）日本的诱降

阎锡山是军阀实力派，他在华北乃至整个中国均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早在七七事变之前，日本侵略者在所谓“华北工作”中就把阎锡山作为其重点的拉拢对象。七七事变后，日本即开始对阎展开所谓“对伯工作”，并予以高度重视。日本希望能使阎锡山与南京汪伪政权合流，进而促使其他反蒋将领接踵效尤，导致重庆国民党政权之崩溃，以达到其迅速吞并中国之目的。用日本军政要人岩松义雄的话来说：日阎“两军之所以合作，就日本军而言，其素所冀求于阎长官者为其声望，期待能由发表和平独立宣言，俾引起中国民众及反蒋将领之极大反响，促进全面和平实现”。正是在这一政策指导下，在日军侵占临汾前后，日本方面就积极拉拢阎锡山。在日阎双方签订的《汾阳协定》中，日方允诺“晋绥军之管辖区，先为山西，渐次及于全华北”；“（阎锡山）先任南京政府副主席及军事委员长，将来于适当时机任华北政务委员长及华北国防军总司令”。此外，日方还答应帮助阎方装备兵力 50 万，将“西北实业公司、同蒲铁路及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所辖各工厂”，“完整归还”阎锡山等。在这种利诱下，阎锡山则保证在约定时期内“向

赵承绥：《我参预阎锡山勾结日军的活动情况》，《山西文史资料》第 11 辑，第 11 页。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上），第 6 页。

“对伯工作”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阎锡山进行招降活动的代称。

郭彬蔚译编：《日阎勾结实录》，第 28 页。

郭彬蔚译编：《日阎勾结实录》，第 14 页。

郭彬蔚译编：《日阎勾结实录》，第 14 页。

郭彬蔚译编：《日阎勾结实录》，第 16 页。

重庆政府敦促反共和平。如不接受,则向中外宣言单独行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减轻在中国的负担,把力量发挥在南洋”,故要求阎锡山提前履行《汾阳协定》,即发表独立宣言,脱离重庆政府,以“稳定”华北方面的局面”。而阎锡山却迟迟未能就范,其原因之一是由于日方对他的种种许诺未能兑现。即使是后来,日方为逼迫阎锡山发表宣言公开投降而采取军事威胁时,也从未放弃对阎的诱降活动。1942年1月23日,日军要人花谷正在致阎锡山信中写道:“岩松司令官翘首以待长官出庐,促膝交谈与贵军之提携……使阁下早日主持军政、经济等中枢要职,以谋救国之大计。”同年2月6日,岩松义雄在致阎锡山信中亦写道:“为长官着想,尽早实现合作有四利:甲、免除来自中央、中共的威胁;乙、得到自主能力,例如武器、粮秣及兵源补充等;丙、得以恢复经济力量,例如收回西北实业公司;丁、从南京政府及北平政委会能取得军事、政治及充分的实力”等等。在这些利诱之下,阎锡山又亲自出马与岩松义雄等举行“安平会议”,谈判《汾阳协定》的履行问题。在这次谈判中,因日方逼降过急,而阎鉴于当时国际形势,又不敢公开脱离重庆政府,故使会议“不欢而散”。面对这种僵局,日方又决定暂停关于《汾阳协定》履行问题的谈判,而代之以“互相提携”、“合作防共”的协商。1943年春,日方抛出《日阎政治、军事、经济合作方案》,阎锡山与日方重开谈判,继续“合作”。这说明,在抗战期间,日本的诱降也是阎锡山私通日本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亡国论”的驱使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前夕,面对日本侵华气焰甚嚣尘上,

郭彬蔚译编:《日阎勾结实录》,第15页。

[日]臼井胜美编:《日中战争》第5集,日文版,第485页。

赵承绥:《我参预阎锡山勾结日军的活动情况》,《山西文史资料》第11辑,第13页。

郭彬蔚译编:《日阎勾结实录》,第43页。

[日]臼井胜美编:《日中战争》第5集,日文版,第477页。

《阎司令长官抗战复兴言论集》第9辑(上),抗战复兴出版社出版,第458页。

阎锡山就曾不断散布“亡国论”。特别是在七七事变前夕，阎锡山竟然提出“中国为具亡国条件最多之国”。七七事变后，随着全国统一抗战局面的形成，阎的亡国论一度有所收敛。但是，此后不久，当他目睹日军大举进犯中国，华北大部分国土相继沦陷时，即对抗战前途失去信心，认为至少长江以北地区将不复为中国所有。因此，他提出了所谓“亚洲同盟”的主张，以为日本将为“亚洲盟主”。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侵华气焰更加嚣张，阎锡山臆断美国必将帮助日本，中国抗战终将失败。他炮制了题为《东亚战争，美必助日牺牲中国》一文，令其部下研讨，并指示其高级干部“要引导大家本着‘存在是真理，必要是合法’的口号，进行讨论，最后的结论应该是求和才能存在，如继续抗战，不亡于日，必亡于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的妥协活动顿形频繁，阎日勾结更趋紧密。“当时双方的联络已是公开的秘密。设在太原的阎锡山办事处即位于茂川公馆（日军华北派遣军第二课茂川秀和中佐的办公处——笔者）之旁。阎在其住处克难坡除不断用无线电联络外，还有使者往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阎锡山高唱的日美妥协、牺牲中国的论调破产了。同时，由于美国参战，他对日本在这场战争中能否稳操胜券并无把握，故对履行《汾阳协定》，即发表宣言脱离重庆政府一事，暂取观望态度。正如曾任日军华北派遣军第一军参谋的井宽一大佐在回忆“对伯工作”时所说：“阎锡山是一面观察国际形势的演变和日本的实力，一面忧虑着逐渐被赤化的山西，慎重而耐心地等待着时机的到来。”此时，阎锡山对日本的妥协活动亦有所收

《阎伯川先生最近言论集》，太原绥靖公署编印，1937年版，第58页。

赵瑞：《阎锡山勾结日军的罪恶活动》，第10页。

陈少校：《阎锡山之兴灭》，190页。

何理译：《抗战时期阎锡山通敌史实》，《党史研究资料》（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第6期。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下），第129页。

敛,并诡称他以前与日方的关系是“交浅而言深”、“与日军来往是策略”。抗战后期,阎锡山看到日本在中国和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日本投降已成定局,他的对日态度这才彻底转变。

三 阎锡山与汪精卫之流的区别

抗战时期,有的报刊就曾发表文章,指名道姓地称阎锡山为“汉奸”。新中国成立后,有些人在文章中也往往给阎锡山戴上“汉奸”的帽子¹⁰,把他与汪精卫之流等量齐观。抗战时期,阎锡山是否与汪精卫一样已成为“汉奸”?对这个问题,还应作具体分析和研究。

如前所述,抗战期间阎锡山私通日本,涉及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多方面,其最严重的步骤是同日本签订《汾阳协定》。毛泽东在论述抗战时期的主和派即投降派必然要反共,并寄希望于日本的让步和国际的压力时曾说:“这一套,不但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唱双簧,有些装红白脸。”¹¹从《汾阳协定》的内容来看,阎锡山也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的张精卫、李精卫之流的人物。实际上,在“安平会议”后,连阎锡山的第二号人物赵戴文都已觉察到他私通日本的严重性,故曾警告阎说:如果履行《汾阳协定》,“那种下流汉奸滋味,你能受得了吗?”¹²这说明,当时的阎锡山确实已滑到汉奸的边缘了。

[日]白井胜美编:《日中战争》第5集,日文版,第493页。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4页。

如《解放日报》1945年8月11日至13日先后发表了《汉奸阎锡山公开投敌》《汉奸阎锡山军队的暴行》《汉奸阎锡山横征暴敛的结果》等。

10 赵承绶:《我参预阎锡山勾结日军的活动情况》,《山西文史资料》第11辑,第19页。

11 毛泽东:《反对投降活动》,《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35页。

12 续范亭:《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信》,《解放日报》,1944年8月24日。

但是, 阎锡山与汪精卫之流毕竟有所区别, 这表现在:

(一) 汪精卫之流是公开投敌并成立傀儡政权, 而阎锡山则不然。抗战期间, 阎锡山同日本签订《汾阳协定》, 说明阎锡山确实一度萌发过公开投敌、成立傀儡政权的思想。但后来, 阎锡山毕竟没有履行《汾阳协定》中的这一实质性的规定。相反, 他始终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 并打着抗日旗帜。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季林所说: “他(指阎锡山——笔者)并不被认为是个傀儡。” 与此同时, 他流亡晋西的政权, 在名义上也仍然是隶属于重庆国民党中央政权的一个地方政权, 而并非像南京汪精卫政府那样任日本帝国主义摆布。因此, 从是否公开投敌和成立傀儡政权这一点来看, 不能把阎锡山与汪精卫之流等量齐观, 混为一谈。对此, 日本方面也很清楚。花谷正在战时曾说: “阎为其自身利益, 有合作之打算, 但并没有迅速与我合作成为参加大东亚战争之一部分的诚意……故其在目前阶段, 态度是灰色的。” 岩松义雄亦说: “我等敬服汪精卫氏不顾如此不利之环境, 和日本苦乐与共, 从事大东亚建设之气概, 而遗憾者乃阎将军之周围缺乏如是者。” 井宽一在回忆“对伯工作”时说得更为明白, 他说: “对伯工作虽终归失败”, 但“从阎锡山的立场看来, 可以说达到了善保其身的目的”。也许正因为如此, 故日本方面认为阎锡山是一个“老奸巨滑不吃亏的家伙”, 是“优柔寡断”、“难以揣度的人物”。

抗战期间, 阎锡山没有或不敢发表宣言, 公开投敌, 其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是共产党力量的威慑和国民党爱国官兵的强烈反对。用阎锡山的话来说: “剧然发表宣言, 本身及环境均不许可, 即在內

[美]唐纳德·G·季林著、牛长岁等译:《阎锡山研究》,第305页。

郭彬蔚译编:《日阎勾结实录》,第131页。

郭彬蔚译编:《日阎勾结实录》,第102页。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下),第129页。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下),第124—125页。

部会发泄愤懑, 环境上会骤遭夹击, 恐事将失败, 实于前途不利。”对这一点, 日伪方面也有旁证。例如, 花谷正曾说:“阎长官对合作犹豫不决, 原因在于害怕汉奸的污名。”汪精卫亦说:“看到小生(汪自称——笔者)参加和平建国后孤立的立场, 阎恐重蹈覆辙, 不敢迅速主动地出马从事和平建国, 这是完全错误的。小生参加和平建国运动后的痛苦处境, 正是由于阎等不敢迅速参加建国所导致的。”二是国际形势的变化。《汾阳协定》墨迹未干, 便爆发了太平洋战争。阎锡山对日本在这场战争中能否取胜没有把握, 故暂取“观望”态度。对此, 蒋介石侍从室第一组组长唐纵在当年的日记中亦曾写道: 阎锡山与日伪要人“预定(1942年)12月28日在孝义会面, 发表和平宣言, 迨太平洋战争发生, 阎之态度改变”。另外时任日伪山西省长的苏体仁曾在致阎锡山电中也透露:“交涉停顿之原因在贵方(指阎方——笔者)是否存在着要待看清日本对英美战争(胜负趋势)影响之心理。”

(二)汪精卫之流是自甘充当傀儡, 而阎锡山则是为了自保一方地盘。阎锡山私通日本, 进行妥协活动, 旨在借助日本势力对付共产党并同企图借抗战之名吃掉他的重庆政府分庭抗礼, 以保住山西独立王国, 而不甘像汪精卫之流那样充当日本儿皇帝。事实也正是这样。例如, 1940年11月, 阎在指派赵承绶到孝义县白壁关与楠山秀吉谈判前, 曾嘱咐赵说:“你这次去主要是商量四点, 也就是四句话, 即‘亚洲同盟, 共同防共, 外交一致, 内政自理’;前三句对日本人无害, 他们也希望这样做, 会同意, 第四句可能有争执, 一定要争取做到。如果内政不能自理, 老百姓就不会相信咱们, 不跟

郭彬蔚译编:《日阎勾结实录》,第36页。

叶昌纲等译:《关于岩松义雄对阎伯川工作的资料》,《山西文史资料》第27辑,第150页。

[日]白井胜美编:《日中战争》第5集,日文版,第486页。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275页。

郭彬蔚译编:《日阎勾结实录》,第45页。

着咱们走,咱就不会有力量,那就谈不上和他们合作了。这几句话,前三句是咱迁就他们,后一句也要求他们迁就咱一点。如果要让咱象汪精卫那样,我是绝对不干的。”诚然,《汾阳协定》的签订,说明阎锡山一度确曾萌发过充当日本傀儡或儿皇帝的念头,但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阎又退回到原来的立场。1942年2月1日,阎托梁缜武向岩松义雄转达他的意见时说:“确信外交一致和内政自理是达到目的的最好措施。如果能像对德、意那样,至少也能像英国对其自治领那样,就一定能成功。”在同年5月日阎双方召开的“安平会议”上,阎又直接了当地对岩松义雄和花谷正等日酋说:“我们的中日合作只能承认日本是盟主,中国的一切必须自主。共荣不能是日方独荣,共存不能是日方独存。照你们的办法,我无法向中国人交代,从而也不能号召中国人。如果要名存实亡的政府,现在南京已经有了汪精卫,北京也有了王揖唐,何必要我呢?”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阎锡山对日方要求他尽快发表宣言一事,始终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

(三)在对待抗日和共产党的态度方面,阎锡山与汪精卫之流也不尽相同。汪精卫之流是死心踏地与日本合作,共同“剿共”,根本没有采取过任何抗日或联合共产党的行动和措施,而阎锡山则不尽然。早在抗战开始之前,阎锡山就与坚持抗日救亡的共产党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并进行过局部抗战。七七事变后,阎锡山与共产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了进一步合作。在这个统一战线的推动下,阎锡山进行了比较努力的抗战,他领导的第二战区在抗战初期一度还曾被誉“模范战区”。当然,阎锡山和中国大地主大

赵承绥:《我参预阎锡山勾结日军的活动情况》,《山西文史资料》第11辑,第11—12页。

[日]臼井胜美编:《日中战争》第5集,日文版,第472页。

南桂馨、赵承绥:《抗战时期阎锡山与日寇的勾结》,《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4页。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下),第122页。

中共中央党校编写组:《阎锡山评传》,第292页。

资产阶级的最高统治者蒋介石一样,在抗日战争时期具有双重性格,既有抗日的一面,又有反共、反人民对日妥协的一面。但从总体来看,尽管阎锡山发动过反共的晋西事变,却最终没有公开发动“剿共”战争。这与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相似,却与汪精卫截然不同。

综上所述,在抗战期间,阎锡山为了他的自身“存在”,一方面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采取了一些抗日的行动和措施;另一方面又在暗中私通日本,不断进行妥协活动。但总的来说,阎锡山私通日本还有别于汪精卫之流的卖国投敌。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刘兵)

《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出版

居之芬、张利民主编的《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由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该书共31万字,分作“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华北沦陷区殖民地经济的形成”、“日本对华北经济的大规模‘开发’与掠夺”、“国防产业的畸形膨胀与经济的法西斯化”等4章,另附录“华北沦陷区主要经济部门统计表”19种和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大事记”。

(本刊讯)